

二十世纪以来海内外宋代宦官研究综述

秦克宏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宦官是中国皇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来受研究者重视。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明三代,宦官广泛参政,他们在维护皇权的同时,对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转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相较于以上三代,宋代宦官除了童贯、梁师成之外,大多隐而不显。《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传序》称“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貂璫有怀奸慝,旋踵屏除,君臣相与防微杜渐之虑深矣。然而宣政间童贯、梁师成之祸,亦岂细哉!南渡苗、刘之逆,亦宦者所激也。”这是宋代宦官的三个特色:(一)制度上,宋代严格限制宦官势力的发展。(二)权力结构上,皇权始终控制着宦官,同时相权、台谏与宦官势力的制约与平衡,也有效约束着宦官权力。(三)尽管有诸多限制,但在徽、高两朝宦官势力大增,为害亦深。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宋代宦官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特点的多角度阐发上,并在宦官与宋代军事、政治以及宦官制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宋代宦官研究比较沉寂,这一现象值得深思。因此,有必要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找出问题所在。

当前,涉及宋代宦官研究综述的期刊文章主要有冷东《建国以来宦官制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9期),景有泉《十年来宦官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0年第7期),刘泳聪、冷东《近四十年来港台地区宦官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2期),冷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宦官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这几篇文章以中国古代宦官研究为综述对象,而对宋代宦官研究的发展脉络梳理尚不够清晰。故本文试图总结20世纪以来海内外宋代宦官研究的主要成果,并梳理学术发展的线索,寻找新的研究方向和可能性,希望对推动宋代宦官研究有所裨益。

一、宦官与宋代军事研究

宋代宦官参与军事活动者颇多,宦官可领兵、监军、传递军政信息,他们常以此立功,获得升迁。《宋史》卷四六六至四六九为《宦者传》,目录中宦官有传者五十三人,其中北宋宦官四十三人,二十七人立有边功。由此可见,参与军事、立有边功是北宋宦官作用的一大特色。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宦官与宋代军事研究的主要成果表现在:宋代宦官参与军事的影响,宦官参与军事的政治因素和制度规范等两个方面。

柴德赓的《宋宦官参预军事考》(《辅仁学志》第10卷第1、2两期合刊,1941年12月)论述了宦官参与军事及其造成的不良影响。作者从宦官领兵为将,担任监军和走马承受等方面,探讨了宋初宦官开始参与军事至南宋高宗朝被禁的演变过程,进而认为宋代“军政之坏,殆由

于此”,宦官参与军事几乎导致了宋的灭亡。这一观点更新了人们对宋代宦官之祸的认识。柴氏当时的研究条件自然无法和现在相比,文中的部分观点现在看来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但作者所用资料丰富,见解精辟,实属不易。作者对宦官所任军职、宦官参与领兵作战、宦官与帅臣之间的矛盾、宦官与信息通进等方面都有论述,对后学多有启发。当代学者的研究如:王恩厚《北宋宦官预军弊政述评》(《上饶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冷东《略论北宋宦官》(《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姜武福、宋传银《北宋宦官专权干政》(《荆州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等,皆可见柴氏的影响。不过,只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宦官参与军事的原因、相关的制度保障及其势力发展的脉络等方面,才可以揭示宦官对军事产生影响的深层因素。

宋初,鉴于唐代宦官参与军事造成的影响,皇帝一方面对宦官的限制相当严格,另一方面也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参与军事。这种现象应该从皇帝对宦官的利用和宦官的能力两方面来分析。柳立言《宋代的宦官》(台北《历史月刊》第65期,1993年)指出,宋代宦官能文、能武、能理财,正是有这样的才能,他们才可以广泛参与军事、经济等事务。同时,制度上的约束,君权、相权对宦官权势的有效制衡和监督,使得宋代宦祸远较汉唐明为轻。作者随后在《以阉为将——宋初君主与士大夫对宦官角色的认定》(台北《大陆杂志》1995年第3期)深入考察了宋初三朝帝王对宦官的利用、控制和防范。指出,宋初君主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从读史中借鉴到的前代教训,逐渐形成了管理宦官的制度措施:宦官的才能应该用于沙场上,以他们为将,并以边功来考量高级宦官的升迁;阉将由枢密院控制,以外朝的制度来加以约束;不准宦官干预庙堂之政。这些措施有效地防止了阉祸的发生。

柳氏的研究从制度和政治背景层面分析了宦官在军事系统中的地位,但“以阉为将”形成后,宦官领兵对宋代统兵体制有何影响,仍需进一步探讨。陈峰《北宋后期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体制的流弊》(《国学研究》第17卷,2006年)认为,北宋后期,特别是宋徽宗、钦宗二朝,文官控制军事决策和军队的传统,已经到了僵化的地步。在实际用兵之时,宦官往往直接参与指挥和统军,这就形成了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的体制,这种体制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作者观察到了文臣与宦官统军体制造成的灾难,但对这种体制形成的原因论述不多。事实上是发展了柳立言的观点。

二、宋代宦官政治研究

北宋宦官参与军事,掌握地方上部分军政大权。不仅如此,宦官还参与掌管京城探事机构皇城司,并出任走马承受,监视地方军政,两者是帝王监督中央和地方事务的助手,是实现君主集权的重要力量。1938年日本学者佐伯富发表了《论宋代的皇城司》(据《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原载京都《东方学报》1938年第9册)、1944年发表《宋代走马承受之研究——君主独裁权研究之二》(上、中、下,《东方杂志》香港商务印书馆1980年复刊第13卷8、9、10期。原载京都《东方学报》1944年2月、10月)系列论文,对此有独到的研究。佐伯氏以“唐宋变革”为思考背景,考察了皇城司与走马承受在实现君主独裁方面的作用。前文通过对皇城司在监察、监视外交使节、军队、漕运三个方面作用的研究,认为皇城司是直属天子的特务机关,是独裁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后文详细剖析了走马承受在监察军队、

讥察边情、上报民情、传达帝王命令方面的作用。认为走马承受的设立使得“天下诸种情报,得直接保持原状急速传达天子”,“天子命令得直接遍及天下各个角落。于此,天子的独裁权得以无上发展”。但因主题所需,作者主要研究了皇城司、走马承受的职能,对宦官的作用强调不多。尽管如此,作者的研究对学界仍有诸多启示。程民生《北宋探事机构——皇城司》(《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从皇城司的职能入手,具体考察了由宦官掌管的皇城司在伺查军政、察办民俗异事及谤议朝政者、侦察官吏的不法行为、侦捕其他不法或违禁人物、察传其他消息等五方面的探事职能。作者认为皇城司是北宋封建专制的重要辅助工具,是明代厂卫制度的先河。这与佐伯富的观点比较类似。

“上下相维、轻重相制”是宋代政治的重要特征,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相互制约,保持平衡,对维护皇权至关重要。君主集权促使了宦官势力的形成,宦官势力与宰执、台谏等政治势力间的相互关系,宦官势力发展的趋势等,皆为学者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

王明荪在《谈宋代的宦官》(《宋辽金史论文稿》,台北文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中指出,宋代中央集权的确立以及士大夫对宦官的防范,有效抑制了宦官的权势。这足见作者的眼光,但论述过于简单。柳立言的《宋代的宦官》认为君权、相权与宦权之间制衡机制的破坏,造成了北宋的灭亡。张邦炜的《两宋无内朝》(《河北学刊》1994年第1期)指出,宋代外朝大臣掌握着对宦官的任命权、惩罚权,并且,宋代不以宦官“典机密”,使宦官难以凌驾于外朝大臣之上。作者在《北宋宦官问题辨析》(《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中试图解答北宋到底有无所谓的“阉祸”,如果有,其原因何在?该文指出,北宋的宦官广泛参政,此外,可以钤辖、监押、巡检的身份率军作战,同时负责监军,还可侦探臣民、审理案件。这是因为宋代专制制度的发展,皇帝需要以宦官牵制文臣、武将。尽管北宋宦官与政治军事的关系密切,但当时的宦官之祸没有造成废立皇帝、生杀大臣的悲惨结局,对军事的消极影响不及北宋的文臣、武将。作者指出,北宋无宦官之祸,除了太祖时的制度规定外,主要在于宰执与两制、台谏对他们的限制。裴海燕《北宋历史条件下的宦官权力分析》(《中州学刊》1998年第3期)专门考察了宦官与皇权、宰执为首的士大夫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作者认为北宋帝王利用宦官是为了牵制和约束武将、文臣的权力;宦官可以削弱相权,同时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集团也是限制宦官势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宦官与宰相士大夫集团之间的相互制约,是维护皇权的重要手段。

南宋时期宦官势力明显削弱,张邦炜《南宋宦官权势的削弱》(《中州学刊》1992年第3期)对此作了分析。首先,靖康年间,大量宦官被杀或被俘虏到金国;其次,“苗刘之变”中许多宦官被杀,客观上减少了宦官的数目;更重要的是,南宋统治者借鉴北宋灭亡与“苗刘之变”的教训,采取了限制宦官权势的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裁减宦官员额,限制宦官升迁,不令宦官管军,不许宦官干政,惩治不法宦官。作者同时也在文中指出,不能夸大南宋宦官削弱的程度。对于这一论断,王曾瑜的《城狐社鼠——宋高宗时的宦官与医官王继先》(《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从侧面给予了回应。在宦官一节中作者考察了高宗对亲信宦官恃恩骄横的纵容。文章最后以台谏弹劾王继先、张去为为例,指出中国古代监察权根本不可能独立于皇权,这也决定了此类监察制度的局限性。这一论断与上述以各政治势力之间制约与平衡为视角的研究结论有显著不同。

三、宋代宦官管理制度研究

宋代宦官管理制度研究涉及宦官官阶、升迁、差遣、荫补、管理机构等方面,当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单纯的宦官管理制度研究;或以宦官管理制度为视角,观察宋朝对宦官的利用与控制,以防止宦官之祸。

王明荪在《谈宋代的宦官》中,对宋代宦官的管理机构、官阶、执掌做了简要的梳理。文中部分观点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作者认为,宦官的迁转完全要以皇帝的旨意裁决,“宋代官吏通用的磨勘之法,并不完全用之于宦官”。梅原郁的《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京都同朋舍,1985年)第二章《宋代の武阶》(むすびにかえて-宗室と宦官)以较少的篇幅对宋代宦官官阶制度的形成演变以及宦官从事的内外差遣做了简要的梳理,指出宋代宦官官阶与武官官阶大致相同。余华青的《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六章《宋辽金元时代的宦官制度》考察了两宋宦官势力的发展变化。该书主要根据《宋史》、《文献通考》等史料来研究宦官选用、叙迁、奖惩等制度,虽然有史料选择上的局限,但对当时的宋代宦官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部分研究成果现在仍有参考价值。苗书梅《宋代宗室、外戚与宦官任用制度述论》(《史学月刊》1995年第5期)立足于制度设置,解释了宋代因何没有阉祸。这些制度设置包括:定额限员;制定宦者官阶,抑其权势;不令宦官干预政事;不以内侍典兵权。作者认为,“宋代宦官带兵参战并非制度,而是各个时期的权宜措施”。这种观点与柴德赓、柳立言的研究构成了讨论。对于宦官走马承受,作者指出,这类宦官有监军的某些特点,但他们只是传送情报的使臣,没有自己的部属,故权势有限。这是对柴德赓认识的推进。

朱瑞熙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的宦官部分,对宋代宦官的人数、管理机构的编制、人选、职能及宦官的品阶、俸禄等都有初步的研究,指出了宋代宦官管理制度完全官僚化的特点。作者认为,宋代没有严重的宦官祸患,是约束机制发挥效能的结果。宋代皇帝重视对宦官的约束,后来成了“祖宗之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级官员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要求皇帝或朝廷制裁某些内侍,以维护“祖宗之法”;台谏对内侍实行严密的监督;爱国军民自发起来惩处内侍,成为削弱内侍势力的最有效方式。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一编“宦官门”及“官制表格”中宦官相关部分,对宋代宦官管理机构的职能、宦官的迁转和俸禄以及宦官官称的来源、沿革、职掌、品位、编制、简称、别名,都有简明扼要的说明,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宋代宦官的品阶制度。裴海燕《北宋的宦官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以制度上的约束与防范为视角,考察了北宋因何没有宦官之祸。作者提出,各种宦官制度使北宋的宦官管理有法可依,鲜明地贯穿着裁抑和防范宦官的精神。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指出,宋代对宦官的抑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外统内。这是宋代抑制宦官势力膨胀的最关键、也是最有效的措施。其二,限制人数。其三,限定官阶。游彪、刘春悦《宋代宦官养子及荫补制度》(《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指出,宋代的宦官养子制度、荫补制度,既是限制宦官人数过分增加的手段,又是限制和保障宦官集团利益的手段。作者对宋太祖乾德四年“内官及三十已上,乃许养一子,士庶不得以童男养为宦官”这条诏令在宋代各朝的执行情况,做了细致的考察。文中分析了低级、

高级宦官的荫补制度。就低级宦官而言,最详细的荫补法令颁布于熙宁四年,宦官中最低等级的黄门也可以享受荫补的特权。八品以上为高级宦官,他们大多要出宫任职,但也有靠暗转、阁转等方式,违反不许寄资的规定,继续在宫中任职,进而获得了晋升、荫补的诸多实惠。宋代宦官可以享受特恩荫补和回授,但也有严格的止法。回授之法可以限制宦官升至高官。止法和回授结合大大限制了宦官荫补亲属入官。行文中,作者以“似乎”、“可能”来表示不能认准的制度规定,为后来者继续研究提供了思考空间。

以上梳理了宋代宦官管理制度在官阶、升迁、差遣、荫补、管理机构等方面的研究,从中可以发现,研究者较少关注唐宋之间宦官制度的继承与发展。香港地区学者赵雨乐对这方面作了一定的探索。赵雨乐早年留学日本,受日本唐宋史研究思路的启发,从“唐宋军政变革”这一背景出发,对唐宋间宦官制度与军政制度的关系作了细致的考察。他的《宋初宦官制度考析》(《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专门考察了唐末至宋初宦官制度与唐五代军政制度的关系。作者认为,宋代宦官的官阶与唐末五代的军政体系有密切关系,并以三班官为例考察了这种演变。

四、宋代宦官与经济事务

目前,有关宦官参与经济事务的研究比较少。王明荪在《谈宋代的宦官》对宦官参与财经事务有简要的说明。苗书梅在《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指出宦官可以担任监当官、管理市舶司、榷场、参与漕运等。裴海燕在《北宋宦官参预经济活动述略》(《河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中指出,北宋宦官参与的经济活动主要有:参与掌管宫中的财经事务,尤其是对内藏库的管理;监在京榷货务,以及提举诸司库务;参与对外贸易;参与屯田、营田、西城所以及水利工程的建设。作者认为“北宋宦官是代表封建政权参与经济活动的,与前代相比,其经济活动的范围广泛而且扩大了。这表明随着宋代经济的高度发展,宋封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在加强”。台湾地区学者雷家圣《宋代监当官体系之研究》(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09年)对宦官充当的监当官关注不够,也是著作中的缺憾之处。李鸿渊《宋初宦官刘承规传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认为,刘承规是宋初较有作为的宦官,为皇帝所倚重,虽参与了“天书造神”骗局,在大兴土木中浪费钱财。但值得肯定的是,他在革新权衡制、更定茶法、建立健全内藏库条规等方面,体现出了开拓创新精神。

五、宋代宦官研究的几点思考

综上,柴德赓以宦官参与军政的现象为视角,考察了宋代宦官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影响,进而认为宋代有宦官之祸。佐伯富、朱瑞熙、柳立言、张邦炜、苗书梅、陈峰、游彪等人的论述,已超越了对宦官之祸的讨论,进一步从制度设置、权力结构、荫补制度等方面分析了宋代宦官制度的特点,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宦官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影响。但就目前而言,宋代宦官研究进入了瓶颈期,据笔者观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材料和议题的限制。新材料带动新议题,但在宋史研究领域,新材料的发现非常有限,

这制约着宋代宦官研究。就议题而言,议题集中,可供继续拓展的余地小。比如对宋代宦官之祸的研究,研究者从制度设置、权力制衡、荫补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重复论证在所难免,在没有新视角的前提下,继续深入论证的可能性不大。

2. 研究视野的局限。历史的演进有其自身内在的联系性。基于由唐至宋制度上、政治上诸多的内在联系,研究者经常把唐宋当做一个紧密联系的研究单元。但当前宋代宦官的众多研究成果中,除了佐伯富、柳立言、赵雨乐的文章外,多把唐代当做思考的背景,而较少关注两者之间制度上的内在联系。就研究者的兴趣而言,明显侧重北宋,对南宋的研究相对较少,使我们难以从整体上认识宋代宦官的作用。另外,当前的研究成果虽然注意到了宦官势力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制约与平衡,但对宦官与其他政治势力间的合作与利用关注不够。另外如宦官与宋代经济、财政的管理,宦官与监察等方面的研究皆有待探索。

因此,当前要推动宋代宦官研究,既要从宏观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也要在微观上考察宋代宦官制度的演变、运行的机制等。这样即使是些看似“老”的问题,如果从微观角度分析,也会有新的思考和发现。笔者试从以下几个角度提出思考,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宦官与宋代信息渠道研究。信息渠道研究是近年来宋史学界新的研究方向之一。中国大陆地区主要由北京大学的邓小南教授推进。信息渠道与宋代政治史研究关系密切,“信息传递及其管道经营,密切关系着政治运作的动因、决策的形成,以及上下沟通的方式,无疑更应纳入讨论范畴,丰富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内涵”(黄宽重、邓小南《〈宋代的讯息传递以政令运行〉专辑导言》,收入台北《汉学研究》2009年第2期)。但就目前来看,信息渠道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央层面上,讨论较多的是政令颁行的方式与程序、君主的信息渠道、信息的传递方式、公文的称谓和程式所代表的具体含义,对宦官与宋代信息渠道的关系研究有明显不足。

宦官在皇宫为帝王服务,沟通朝廷内外是他们的重要职能。宋代的信息通进机构如内东门司、入内内侍省、御药院等,多由宦官负责,其它如通进银台司、閤门司也有宦官参与其中。京城之外有宦官走马承受上报各地的军政信息,如果有必要,皇帝还会派中使专程调查某些事情。这些皆是皇帝控制时局,进而实现君主集权的重要信息渠道。

对于外派的宦官走马承受、中使,皇帝往往赋予他们监察地方官员的功能,如果能把信息通进与监察结合起来研究宦官,可能丰富宋代政治史的研究。如前文提到的皇城司和走马承受就有这一功能。但佐伯富、程民生更强调二者的监察功能,阎沁恒的《宋代走马承受公事考》(台北《政治大学学报》1964年第9期)则强调了走马承受的信息通进职能。就走马承受而言,信息通进与监察地方是他们职能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结合研究是个可行的方向。

当前已有学者做过宦官信息通进研究。友永植的《御药院考》(《日本别府短期大学部纪要》1987-6)认为,宋代御药院的宦官因其“侧近性”,经常参与军事信息的收集、处理地方的财政、军事事务等。李全德《文书运行体制中的宋代通进银台司》(载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重在考察文书运行,只是在“通进银台司的组织机构”一节中对宦官稍有论及。王化雨的《宋朝宦官与章奏通进》(《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指出,以内侍机构通进奏章,比较迅速、保密,更利于某些决策。内侍机构的运作不仅关系到君主的信息掌控,常常也会影响到外朝官僚的利益,乃至宋廷的稳定。

上述研究已注意到了宦官的信息通进功能,但对宦官信息通进与中央决策的形成、宦官信

息通进职能的演变还需要继续推进。例如宦官走马承受的信息通进职能的发展变化,至今仍然少有人论及。走马承受在南宋初已被废除,但在高宗时,又设内侍诸军承受,负责前线与皇帝之间的信息沟通。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目前只有安倍直之《南宋孝宗朝の皇帝側近官》(《东洋学集刊》88,2002年)、李全德《通进银台司与宋代的文书运行》(《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有所涉及,但对变化的原因和过程论述不详。

2. 宋代的监军研究。宦官监军主要出现在唐、明两代,宋代制度设置上并没有监军一职。当前宋代监军研究有两种观点。第一重视职位,从唐宋制度的继承关系出发,认为唐代宦官监军如都监、监押,在宋初也是监军。第二重视宦官,只要是宦官充任的领兵差遣皆可视为监军,其中也包括都监和监押。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前辈学者已注意到了北宋宦官监军的特点。柴德赓《宋宦官参预军事考》监军一章认为,北宋时“钤辖、都监、监押、巡检为监军”,但又言监军“掌军旅屯戍边防训练之政”。方豪《宋史》中相关部分也提到,“宋代宦官领军之外,并多有任所谓监军者,其职名曰钤辖、都监、监押、巡检,亦有称经制、安抚、制置者”。事实上,北宋前期的都监不仅监军而且参与领兵。张其凡《宋代宦官对军队的监督与指挥概述》(《中州学刊》1992年第3期)把宦官监军与指挥军队放在一起研究,实际上揭示了宋代宦官既是监军又是将帅的事实。

上述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宋代监军的特点,但对监军制度的演变过程关注不够。朱熹曾认为:“都监乃是唐之监军,不知何时转了?”由此看出,朱熹当时也产生了困惑,不知何时都监的监军职能发生了转变?《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九引《两朝国史志》载:都监、监押“掌屯戍、边要、训练之政令,以肃所部”。以此处的记载来看,都监、监押履行的不是监军职能,而是带兵的将官。柳立言《以阉为将——宋初君主与士大夫对宦官角色的认定》考察了宦官由阉官系统下的武人到将官系统下的阉人这一转变过程,指出太祖朝宦官以皇帝特使参与军事,但不一定接受主帅的命令,至太宗朝阉将被纳入军事系统归枢密院管理之后,阉将要接受帅臣的指挥,枢密院的管理。作者还认为,宋代都监、监押由监军过渡到领军这一过程在唐末五代已经发生,到宋太宗至道元年成立了专门的监军,即走马承受公事,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但这个解释不能说明为何真宗、仁宗两朝还有大量都监、监押是监军的记载,对走马承受监军的性质也需进一步考察。这些都可以构成进一步研究的基点。

陈峰《北宋后期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体制的流弊》认为,北宋后期,特别是宋徽宗、钦宗二朝,形成了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的体制。如果这一论断成立,我们需要追问宋代监军与统兵应该如何区别?宦官从监军到统兵,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3. 宦官管理制度研究的可能性。宋代宦官管理制度有自己的特殊性,如何认识宦官的选任与管理,有待更多的实质性研究的推进。比如:可以进一步研究军功在宦官差遣中的地位,宦官差遣与使臣差遣的矛盾、宦官宫中差遣与外任差遣的关系等。就宦官的升迁而言,军功占重要地位,如神宗就曾说“内侍旧制须经边任五年”才可升任押班。神宗时,宦官李继和卒,其子求赠官,神宗言:“继和无军功,何必赠?”这两条材料表明军功、边任差遣在宦官升迁中的作用,但已有的研究对此揭示不够。当前对宦官的管理机构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内臣寄资法、宦官参与的礼仪活动方面的研究,简单的制度梳理多于实质性的考察。与宦官制度相关的细微层面,如寄班祗候(友永植发表有《寄班祗候考》,别府大学史学研究会《史学论丛》19,1989

年)、寄班使臣则少有人关注。

4. 资料的利用与研究方法的改进。资料的利用既包括对旧资料的深入挖掘、解读,也包括史料方面的拓展。对旧资料的深入挖掘、解读,要求研究者对史料做合理的辨析,而不是简单的罗列、梳理。史料方面的拓展既包括充分利用常见史料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文献通考》,也要充分利用笔记小说、文集、地方志、碑刻、图画等新资料。在发掘新史料方面,石刻无疑有重要价值。可资利用的有台湾新文丰出版社的《石刻史料新编》、国家图书馆编订的《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全宋文》的出版为我们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提供了便利。何冠环《〈全宋文〉所收碑铭之宋初内臣史料初考》(《东吴历史学报》2004年第11期)根据《全宋文》(旧50册版)前八册的资料,补充了《宋史》在细节记述上的诸多不足。

目前,由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中研院史语所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三方合作进行开发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简称“CBDB”,相关内容可参看:<http://www.zggds.pku.edu.cn/006/cbdb/001-1.mht>)宋代部分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利用这个数据库的资料可以非常容易地建立人物之间社会关系网络,有利我们认清宦官在宋代政治中与其他集团的关联,深入挖掘宦官的社会网络。

另外,近年来香港学者何冠环的《北宋内臣蓝元振事迹考》(《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北宋内臣蓝继宗事迹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0年1月第50期)提出研究宋代官僚系统中的“内臣世家”,也是可继续推进的研究方向。

1979年以来宋徽宗书画研究综述

刘 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 北京 102488)

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北宋第八位皇帝,虽然说北宋是在其子宋钦宗手中灭亡的,但宋徽宗是在金人铁骑包围都城而无计可施的紧急情况下才将皇位传给其子宋钦宗的,确切来讲,北宋亡于宋徽宗之手。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赵佶无疑是失败的。但是,作为著名的书画皇帝,他不仅个人艺术成就高超,而且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从制度和人才培养、名品收集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从宋代以来的画著开始对其书画成就进行记录并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近代以来更多学者对其书画作品从整体或者单个的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对其在绘画发展形式和培养绘画人才而设立的画院,以及在其统治时期形成的宣和文化进行研究。囿于见识,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相关研究作一粗略梳理。